

#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 语言的 超越与超越的语言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张 杰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和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构成原苏联符号学王国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 其理论影响引起了我国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至今还主要是对他们理论的分别研究, 尚未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本文则力图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探索他们如何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的不同途径, 共同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 揭示他们怎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构建多元共生的批评模式, 从而指出他们对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 巴赫金; 洛特曼; 符号学; 结构; 语境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02)04-0133-07

翻开国际符号学研究的地图, 俯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原苏联文艺符号学发展的版图,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庞大的符号学王国完全可以与西方的符号学帝国相媲美, 它是由两根重要的理论支柱构架而成的。他们就是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1895- 1975)的社会符号学和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1922- 1993)的结构文艺符号学。20世纪原苏联的这两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学术成就早已跨越了原苏联本土的疆界, 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 我国理论界对巴赫金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分别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探讨, 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曾两次撰文分析了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构成, 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北京大学的孙静云教授等都曾专门论述过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撩开了原苏联符号学王国的神秘面纱。然而, 与我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相比较, 特别是对以索绪尔、皮尔士等为代表的符号学体系的研究而言, 我们的研究又显得十分不足, 我们既缺乏对这一符号学王国构成的系统研究, 更缺乏对他们之间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其实, 深入探索和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理论本身, 而且还能够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收稿日期: 2002 - 05 - 12

作者简介: 张杰(1957- ), 男, 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不同的途径: 语言学与超语言学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与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都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前者主要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后者则更多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借鉴并把它运用于艺术符号体系的研究。他们都是在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符号研究体系的,只不过所走的途径不同。

我们知道,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是一种“一分为二,强调一点”研究方法。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强调内部语言学;又把内部语言学分成共时性语言学与历时性语言学,注重共时性语言学;接着将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分为语言与言语两个方面,突出语言研究等等。显然,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体系的内部关系研究,而相对忽视言语的研究。

巴赫金敏锐地察觉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并对这位瑞士语言学家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把自己的语言学对象主要确定在言语上,即不像一般语言学以研究句法、词法等系统性特征为目标,而是研究在社会交往中,具体语境中活生生的对话人的言语特征。巴赫金的这种以研究言语为特征的语言学,走的是超越规则、体系的另一条研究途径,因此也被称为“超语言学”。

在远古时代,当人类语言还处在孩提时代时,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在氏族社会的村落中,人们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经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与咒语。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它发自每一个念咒语者的虔诚的心,但几乎没有一个念咒语者能够明确阐释这种语言的真正涵义。这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含糊不清的混沌语言。对于这些念咒或祭祀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歌谣或魔咒的意义,不是这种模糊“语言”的逻辑,更不是所谓概念和语法,而是抑扬的诵调、跌宕的节奏,饱满的情绪和神秘的氛围,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幻觉、联想和意象。一句话,关键在于“语境”,而不是“逻辑”或“规则”。正是这种“语境”能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使人感到语言的神力或魅力。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原始的语言就不具备意义和逻辑了,只是这种意义和逻辑已经与原生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它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特作用。这可以说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混杂。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发展了多少万年。随着科学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特别是从亚里斯多德起,“逻辑学”的萌发与形成,人类逐渐掌握了“归纳”、“推理”、“演绎”与“分析”等思维方式,开始一步一步摆脱了原始的混沌,语言也由此渐渐从原始状态中走出。这样,语言符号的研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以研究“语境”和“言语”为主的话语学研究;一是以研究“规则”和“体系”为主的语言学研究。

面对这两种语言符号研究的途径,洛特曼走的显然是语言学的研究途径,努力从艺术语言符号的整体结构上去把握艺术现象,找到一种结构艺术作品的体系与模式。巴赫金显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的话语学研究侧重的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语境以及因此产生的氛围。

如果说洛特曼试图用语言学的体系去框架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而巴赫金则力图超越语言学的“牢笼”,进行超语言学的话语研究。所谓超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和‘文化’或‘语言行为’这样一些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sup>[11](p. 213)</sup>

洛特曼作为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继承者,沿着语言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从运用语言学研

究的方法分析文学现象的体系性与结构性,到把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到去探讨整个文化体系。在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那里,科学性、确定性、系统性是最主要的特征。然而,巴赫金却是作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者,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语话分析中,对话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则占据着主导地位。洛特曼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符号学,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运用语言体系研究来构建的;巴赫金的符号学是社会学的符号学,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探讨来确立的。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艺批评更强调“神韵”、“风骨”和“意境”的缘故,巴赫金的话语批评在中国更受到关注。其实在俄罗斯,洛特曼与巴赫金是并驾齐驱的两位理论家,洛特曼学说的影响并不比巴赫金逊色。

## 二、殊途同归:走向社会文化系统

当代俄罗斯著名洛特曼研究专家鲍·费·叶戈罗夫在1999年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出版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专门就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章,揭示了他们在符号学研究中学术观点的异同。<sup>[2]</sup>

尽管洛特曼一直非常尊重巴赫金,但是巴赫金作为年长洛特曼一辈的学者,在一开始就非常冷淡地对待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这并不是因为巴赫金本人凭借自己在文艺学界的声望而看不起初出茅庐的洛特曼,而主要原因在于,洛特曼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继承者,其文艺符号学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传统的延续。巴赫金则早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猛烈地批判了文艺学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语词符号的理论主张。

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在最早出版的两本论文集中,就把词的意义与语音外壳相分离,只强调后者的作用,把词语看成是“无意义”的,把词的构造和作品结构仅仅归结为纯语音学的物理现象和纯语言学的语法现象。巴赫金认为,任何词语和符号都是社会行为,虽然它们也是单个的音、发音和视觉的综合体,但同时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倘若没有社会历史具体环境中的交际活动,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巴赫金指出,“语言是社会评价的体系。”<sup>[3](p. 166)</sup>

胡壮麟教授在《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中,曾总结过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即巴赫金所论述的符号的独特性有四点:1)物质性:符号是有物质基础的,即以物示物,由此产生意义;2)历史性: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都与所处的时代有关;3)社会性:只有在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集体中,个体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4)意识形态性:当形象转化为象征后,构成意识形态。<sup>[4]</sup>巴赫金的这一符号学思想一方面确立了以对话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符号学理论。

相比较而言,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除了还保留对符号的物质性特征探讨以外,则较少涉及符号的符号系统之外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洛特曼虽然也像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那样,重视文学史的研究,常常从文学发展史中寻找材料来说明问题,比如他对普希金和卡拉姆辛等作家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由于洛特曼是一位形式主义符号学家,他更多地还是把这些材料置于文学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中来谈论的。洛特曼要揭示的是艺术符号与符号之间结构的规律性。

应该说,洛特曼及其同事们已经注意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局限,他们对彼得堡学派的继承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批判继承。他们一方面在用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摆脱传统的纯认识论的批

评方法,另一方面又在竭力避免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免重新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洛特曼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知觉”作为一个系统提出来,克服了一定的片面性,揭示了艺术符号作为交际系统的特征。然而,由于洛特曼封闭于艺术符号的语言体系研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一体系研究的作用,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局限性。

一个艺术本文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实现着艺术信息的传递,这时它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即艺术信息和艺术语言。前者是艺术本文要向信息接受者传递的内容,后者则是实现这种信息传递的机制。尽管信息传递的机制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洛特曼的艺术符合学只局限于艺术语言机制的研究又是很不够的。没有艺术信息的语言传递机制是毫无疑问的。洛特曼把自己的研究囿于语言体系之内,而基本上不去探讨艺术信息的来源,不去研究艺术信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显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老路上去。

显然,洛特曼从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到继承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走的是一条体系化形式分析的道路;巴赫金从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到反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走的是一条非体系化的社会批评道路。

不过,这两条不同的符号学研究途径最终又在文化转向和系统化两个方面交汇到了一起,真可谓殊途同归。巴赫金对洛特曼理论的冷漠,其实主要是针对洛特曼早期的理论而言的,也就是《结构诗学讲义》(1964)和《艺术本文的结构》(1970)等著作。巴赫金于1975年就去世了,因此他不可能看到洛特曼及其领导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由结构文艺符号学向社会文化符号学的转向。然而,正是这一文化转向使得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向巴赫金理论靠拢。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莫斯科出版了代表洛特曼及其领导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最新研究成果的一套《语言·符号·文化》丛书。该书主要包括了《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乌斯宾斯基选集第1卷·历史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乌斯宾斯基选集第2卷·语言与文化》乌斯宾斯基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史概要(11-19世纪)》托波罗夫的《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神秘性和圣徒》雅可夫列娃的《世界的俄罗斯语言图画片断(空间、时间和接受模式)》等学术专著。这套书充分反映了该学派这些年来主要发展特征,即由对语言符号体系的研究,转向文化符号体系研究。

80年代后期以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已从运用语言学方法探讨非语言学客体,转向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符号体系。他们关心的是符号研究的客体体系,即现实的文化符号结构。他们一般不去讨论抽象的符号分析方法论。从后来出版的该学派的主要著作中来看,宗教符号研究的比重在加大。这不仅表现在对宗教符号本身的研究上,而且更主要地反映在用宗教思维去看待艺术符号。

从系统化的方面来说,洛特曼又发展了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洛特曼强调,一个系统内部各个部分意义的相加要小于整个系统的意义。他甚至后来还婉转地修正了巴赫金理论中的对话概念。洛特曼指出,巴赫金关于对话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他认为,对话其实是一种新信息的再生机制,也就是对话所产生的信息量大于两个话语意义的相加。

因此,巴赫金与洛特曼分别从对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或批判,从语言的超越(言语研究)或超越的语言(语言研究)这两条不同的途径走向了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道路上来。这两根原苏联符号学的理论支柱交汇在一起,构建起了原苏联符号学的理论大厦。

### 三、方法论的启示: 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

其实,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理论贡献已经越出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他们分别从体系的外部(言语)和内部(语言),突破了传统的批评思维模式,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给予了我们以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固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分析问题。虽然现在文艺工作者们早已不再沿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模式来庸俗化地看待文学批评流派的对峙,不再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来简单地区分人物形象的类别。但是,文学的研究在根本上并未摆脱二元对立模式的限制,例如,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对立,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等等。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语言与言语的对立模式,但仍然把自己的语言表征危机等基本观点,建立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解构主义语言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新历史主义的确立也是首先指出了旧历史主义的贫困,强调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的矛盾。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论述的表层意义上,还是在研究观念和思维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原苏联和西方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

应该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各种批评理论流派中的反应还仅仅是表层的,更深层的反应最集中地表现在批评思维的范式上。理论界随着研究由认识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转向,思维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基本上是在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的二元对立之间来回摆动的。在20世纪上半期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所自觉运用的研究思维范式主要是逻辑学范式。其主要特征就是寻找研究对象间的共同点,通过归纳、论证、演绎,从而寻找到它们中间的某种确定的因素,进一步指出对象的本质。到了20世纪上半期,当胡塞尔建立了现象学理论后,西方文论已不满足于用逻辑学思维范式来分析文艺现象,开始探索用新的现象学思维范式来解构逻辑学思维范式。这一新的研究思维范式并不过分注重由逻辑推理得出的研究结果,却更注意探讨和感受过程本身,它不努力揭示复杂现象间的共性,而是区分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个性,从而探讨这些现象间的非规律性和偶然性。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期,学术界在经历过一场思维范式转换之后,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审视范式转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研究走进了语言符号游戏的怪圈,这一审视又使研究转向了新的逻辑学思维范式,进入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大文化之中。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来不一定对立的概念相互对立起来,甚至在考虑问题时也很容易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其实,无论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还是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都可以是相互共存的,并且应该是共生互补的,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洛特曼及其同事们在构建结构艺术符号学理论时,主要采取的是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并以此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动了批评思维模式向多元共生的转移。洛特曼首先把艺术放置到大文化系统中去考察,把它看作是一种与科学模式、道德模式、宗教模式、哲学模式、游戏模式等并存共生的独特模式,在横向的比较中见出艺术创作的独特因素。然后,他又将艺术当作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认识与交际双重功能并存。从艺术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来看,艺术具有认识功能;从艺术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来看,它又具有交际功能。这两种功能的交织便规定了艺术作品符号系统的特征。在艺术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又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洛

特曼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二者共存于同一结构之中……”<sup>[5] (p. 48)</sup>

洛特曼还认为，在艺术这个系统中，艺术创作、艺术本文和艺术知觉三者是相互依存，共生于一个整体之中的。他特别重视艺术本文系统的研究。在洛特曼那里，艺术本文是相对于非艺术本文存在的，艺术符号是在与非艺术符号比较中见出自己特征的，词语符号与非词语符号共生，各类艺术形式平等共存等等。

显然，洛特曼在注意区分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特征时，更强调他们间的相互联系，重视系统性。洛特曼明确指出，系统大于个体相加的总和，甚至如若没有系统，个体也就无法存在，或失去存在的意义。洛特曼的批评思维模式的多元共生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与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既存在着相似之处，又有着不同之处，甚至可以说相似之处有不同，不同之处有相同。具体说来，巴赫金与洛特曼都十分注重“关系”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只不过洛特曼注重的是艺术符号体系（语言）内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巴赫金重视的则是体系之外的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艺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

可以说，洛特曼主要是从体系化的语言研究来推动思维模式的转换的，而巴赫金则更主要是从非体系化的言语研究或曰对话研究来实现多元共生的批评探索的。巴赫金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话语，努力走出体系的限制，把空间的静态分析与历史的动态分析融合起来，把本文的形式研究与文化的语境研究联系起来。巴赫金凭借着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了解，探索的是一条把中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起来的语境批评途径。<sup>[6] (pp. 71-72)</sup>

从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传统来看，特别是从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来考察，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无论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有多大的差异，研究所择取的角度有多么的不同，但是他们的文艺探索大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以解决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主要矛盾为着眼点，或是以作者为中心，或是以文本为中心，或者干脆脱离作者与作品以读者为中心。这种研究往往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清晰性，但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在认识方法上往往强调对认识对象的总体印象、感悟、领会，而不太注意对事物局部的精确把握。因此，我们又可以把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称为是经验式批评，“整体式”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就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读者（作品的社会效应）的一揽子考察。在具体分析文艺作品时，往往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探讨，以求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比如，在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中，“神韵”、“意境”、“风骨”常常是我们衡量一个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方面。

如果把中西方文论的研究做一个比较，在我们看来，也许用中医和西医的特点来加以区分是最合适不过的。中医强调“整体的把握”，如“神”、“气”等，而西医则习惯于“局部的解剖”，哪里有问题就用手术刀割开哪里。前者多半凭经验，后者主要靠科学。

巴赫金努力汲取中西方文艺批评传统的长处，通过对话语境分析，把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整体性”与西方文艺批评的“科学性”结合起来，试图发掘出艺术本文意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探索出一条更加能够揭示艺术特性的批评途径。

巴赫金与洛特曼不仅分别代表着原苏联符号学研究的两条途径，而且反映着文学和语言符号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向。前者是从体系外部的动态研究摆脱了体系的束缚，后者是从体系内部的静态研究超越了体系。这两种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为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 参考文献:

- [1] R·R·K·哈特曼和F·C·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 [2] 鲍·费·叶戈罗夫 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M] 莫斯科: 新文学观察出版社, 1999.
- [3] 巴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 漓江出版社, 1989.
- [4] 胡壮麟 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J] 外语研究, 2001, (2).
- [5] 洛特曼 结构诗学讲义[M] 载《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莫斯科: 格诺齐斯出版社, 1994.
- [6] 张杰 巴赫金与中国文学[J] 出版广角, 1997(3).

(责任编辑: 常根荣)

# Construction of the Semiotic Kingdom: Linguistic Transcendence and Transcendental Language

—A Study in Semiotics of Bakhtin and Lotman

ZHA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Bakhtin's social semiotics and Lotman's structural literal semiotics are two important mainstays of the realm of semiotics in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influence of their theories has already gone beyond the border of their motherland and started to catch atten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and semiotics circles in our country. However, our studie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ir theories respectively, leav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theories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ology features untouched. This thesis aims to compar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Bakhtin and Lotman's theories and probe into how they together mad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ulture systems through the different ways of linguistics and metalinguistics. It reveals the way they built the new critical pattern via a shift from dualism to pluralism. Accordingly,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emiotics and the whole social humanities studies.

**Key words:** Bakhtin; Lotman; semiotics; structure; context